

概说古代中国绿松石器的发展及其礼仪性

张昌平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绿松石器和玉器有着相近的物理和社会属性,且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元素。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绿松石器的发展,经历了串饰、礼器、粗装饰、精装饰等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早期发展趋向礼仪化,较晚则趋向宝石化。除了二里头的绿松石龙、牌饰作为礼器之外,类似兽面构图的礼器一直延续到中商时期。绿松石的装饰性,不仅在早期国家阶段的礼器,在其他类别的绿松石器,也一直表现出礼仪性。

关键词:绿松石;发展阶段;工艺形态;礼仪性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2)04-0035-10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绿松石矿储量和开采量,因此从古代到当代也一直是最大的绿松石器出产国^①,绿松石装饰也成为古代中国示踪中原文化的元素。不过,对于绿松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的认识,我们国内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学界,无论是对当代的还是对古代的,似乎都有欠重视。这可能缘于绿松石往往用作从属于主体器物的附饰,或者缘于绿松石被玉器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器类的光芒所掩盖。本文尝试梳理古代中国绿松石的发展概况,以揭示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礼仪性。

一、绿松石器的发展简况

绿松石和玉器一样,往往是用作装饰;也和玉器一样,切割、打磨等工序是基本的制作环节,并在制作过程中不断被裁减、缩小。绿松石原料体量都较小,难以制作像玉器那样多种不同的器类,更难以制作像牙璋、戈、璧、琮等较大的器物。绿松石制品亦即绿松石器在形态上的类别,可分为单独,或多个地穿孔

串联而成的串饰^②;切割成嵌片,并镶嵌组成新器形;制作成象生器之类的独立器物。这其中的嵌片,又可细分为独立嵌入的独片、连续分布的联片。以上串饰、嵌片以及器物各自都有从史前到当代的长久发展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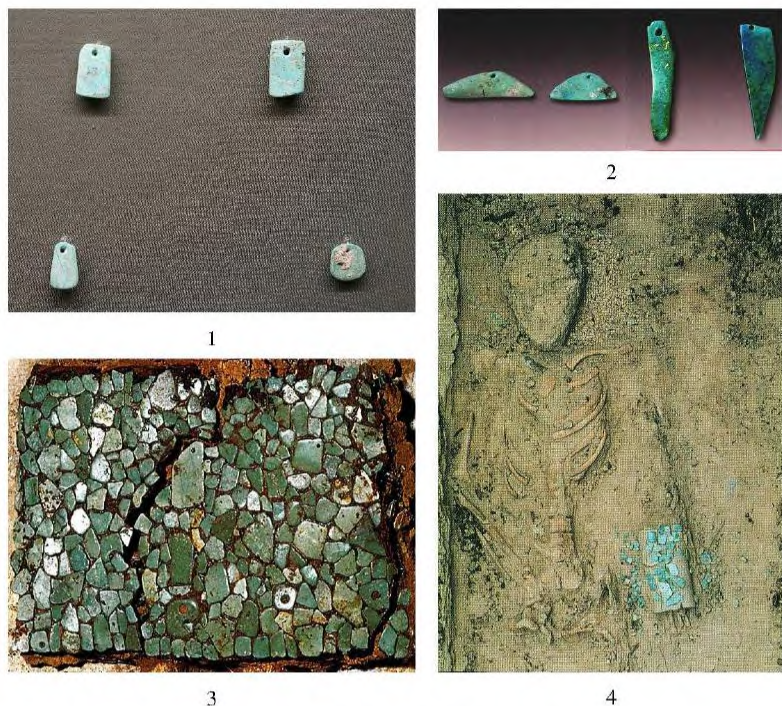
绿松石器几乎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古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各个时期。依其功能和社会性质,本文将其大体分为串饰、礼器、粗装饰、精装饰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串饰阶段,主要流行在新石器时代。多直接用于人体装饰。

从裴李岗文化开始出现至新石器时代末期,绿松石器主要是以串饰的方式直接佩戴在人体上。在史前经过约4000年的发展,绿松石器从加工到装饰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绿松石器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出现时间较玉器为晚。作为装饰品,绿松石器自然会受到其时玉器在制作和使用上的影响。基于个体较小的原料,早期绿松石一般只见串饰,这在舞阳贾湖绿松石器中比较明确^③(图一,2)。除了钻孔作为串饰所

作者: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图一 新石器时代的绿松石装饰

1.章丘焦家串饰(国家博物馆展览自拍图片) 2.舞阳贾湖串饰 3.襄汾陶寺M2001:3腕饰 4.同德宗日M322腕饰

需之外,早期绿松石器还都会进行切割定形和打磨修饰,以便使器体较为规整和光洁。这样,玉器和绿松石器作为早期装饰品,普遍运用切割、钻孔、打磨等技术,制作较普通石器更为精细和讲究,也加速了石器等手工业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时代,绿松石器进入发展的繁荣时期。绿松石器发现在更多的地点、更广大的区域,产品有了更多的种类、更大的数量、更深的加工。这一阶段绿松石串饰形态上也有较大的变化,较多的被加工为较规整而扁平的牌形。这种牌形绿松石器有的还搭配加入玉或石材,形成复合材料的串饰。也有不少绿松石取其自然的珠形或筒形,多颗串联。以绿松石为点缀的复合材料串饰、多颗串联或单片的单一材料串饰,两种形式形成不同视觉效果,也成为此后串饰长期发展的模式。这一时期有的串饰还被制作成象生的形态,如红山文化喀左东山嘴绿松

石鸮,其宽和高达到2.8和2.4厘米^[4]。绿松石串饰的发达,尤其表现在大汶口文化中,近年的考古项目章丘焦家、滕州岗上遗址都有较多的发现^[5](图一,1)。大汶口文化还出现镶嵌在玉、骨等器物中的圆形独片绿松石,这一装饰方式也在后世被广泛运用。仰韶时代绿松石器的分布遍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6],呈现出强大的传播能力。

新石器时代末期绿松石器在此前各区域继续使用,但不同地区使用的数量和方式多有变化。一是此前绿松石器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区域,绿松石器的数量明显减

少,而黄河上游和长江下游地区绿松石器的数量明显增加。后两个区域很可能是邻近的绿松石矿源得到了开发,并在其后更晚的时间有大量的产品出现。这一阶段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连续多片的联片绿松石制品。联片绿松石器最初是在大汶口文化中作为饰品出现的,并在其后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流行,在临汾下靳墓地^[7]、襄汾陶寺墓地^[8](图一,3),以及青海同德宗日M322都是用作腕饰^[9](图一,4)。腕饰可以说是串饰的升级产品,临汾下靳、襄汾陶寺腕饰中,都有串饰被拿来加入作为嵌片的。而较之此前的牌形串饰,嵌片是对绿松石进一步的精加工。良渚文化中,浙江桐乡新地里、上海青浦福泉山等地出现弧面的圆形绿松石器,是在表达动物的眼睛,说明以绿松石为核心材质的、兽面之类的神灵形象已经出现,这与同时期玉器中大量类似神像的出现是协调一致的。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学者认为山东龙山文化中像临朐西朱封M202、日照



图二 二里头绿松石器

1.二里头2002 V M3:5龙形器 2.二里头1981 YLV M4:5牌饰 3.二里头1984 YLV M11:7牌饰

两城镇M33大墓中的绿松石联片组成的图案，是具有礼仪性质的神灵形象^[10]。

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与玉器的发展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二者都作为装饰品，器物取形和佩戴方式类似，并在不同的区域文化中都共同被广泛地接受和传播。这些说明早期中国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

第二阶段：礼器阶段，属于二里头文化至中商文化时期。使用精制的联片制作礼器，专用于礼仪性场合。

物质文化礼器化的倾向，在仰韶时代就已有明确的表现。大汶口文化陶器中形制相同的列器、红山文化玉器中猪龙和钩云形器等都表现出礼仪性。龙山时代玉礼器大行其道，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绿松石联片所构成的图像，也包含了礼仪性的表达。以上包括绿松石器等礼器的兴起，既是社会复杂化的体现，又是二里头文化绿松石礼器的形成基础。

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器集中出现在政治中心二里头，联片器类多为龙形器和牌饰。已报道的龙形器属于年代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2002 V M3^[11]（图二，1），龙形器长64.5厘米，由2000余片联片绿松石组成，构成了已知中国青铜时代最大的镶嵌绿松石器。青铜牌饰的年代多较晚，目前有明确出土背景的3件

青铜牌饰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12]，其中1981 YLV M4:5牌饰长14.2厘米（图二，2），1984 YLV M11:7牌饰长16.5厘米（图二，3）。这些绿松石器通过联片组成较为大型的器具，突破了绿松石材料在体量上的限制。绿松石器联片加工精良，正反两面均经过打磨，有的侧面做成楔形便于粘结^[13]。龙形器和牌饰还有更多的发现，根据学者统计，二里头遗址可能出土有超过15件绿松石镶嵌牌饰——包括青铜主体或有机质主体的^[14]。这些绿松石器都出土在目前所知二里头的大型墓葬中，往往同出有铜铃等其他高等级材质随葬品^[15]。二里头还在宫殿区之南设有专有的绿松石作坊区，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服务于王室^[16]。二里头联片绿松石虽然也是附着在其他材质上，但绿松石无疑是器物核心。绿松石器作为礼器，无论是器物所代表的性质，还是器主的社会地位，也都是相互匹配的。

二里头文化绿松石器作为礼器，发展延续到中商文化时期。郑州小双桥遗址祭祀坑和黄陂盘龙城遗址高等级墓葬多见绿松石嵌片器。属于中商文化时期盘龙城遗址杨家湾M17出土有绿松石联片和黄金嵌片组成的饰件^[17]（图六），使用绿松石近600片，这也是迄今东亚地区所见最早绿松石与黄金结合的器



图三 商周时期的绿松石青铜器

1.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兽面纹钺 2.叶家山M111柄形器 3.曾侯乙盖豆 4.新郑烈江坡错金兽首带钩(局部,河南博物院展厅作者自拍图片)

物。该饰件原来很可能是依托在某种有机质主体之上,下葬时经过有意识的碎器破坏后埋藏。饰件中绿松石嵌片每面都有打磨,一些嵌片的侧面还打磨成斜面,或可能是为了塑成半浮雕的造型效果,这使其在造型风格、工艺技术上都和二里头文化绿松石器一脉相承。M17绿松石与金器构成的虚幻动物造型,也是中原文化系统中所见最早的成形金器。目前对这件绿松石器的复原,有兽面纹或龙纹等不同意见^[8],但该器无疑和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一样,属于礼器的范畴。

第三阶段:粗装饰阶段,主要流行于殷墟文化至战国时期。嵌片绿松石一般以联片的方式与青铜器器具结合,成为后者的装饰。

约当始自殷墟文化第一期并繁盛在殷墟文化第二期,绿松石嵌片主要装饰在青铜器上。这主要包括兵器如钺、戈、刀(图三,1),以

及车马器如弓形器等等器类,构成兽面纹、夔纹等虚幻动物纹样,八角星、条形等几何纹样,以及圆形独片表达的动物双眼等。这表明绿松石由组合成牌饰这样的礼器,转向对器物的装饰。

殷墟文化时期开始,绿松石生产还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产业继续得到发展,产品数量、种类有了很大的增加。在一些单位如妇好墓、小屯M20中,绿松石器都有多件甚至是大量出土。绿松石产品除了传统的串饰和嵌片装饰之外,还常见独立造型的蝉、蛙等象生器。这些表明当时绿松石矿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采,绿松石资源较为丰富;其二是绿松石产品使用阶层的泛化,除了高等级贵族

族拥有较多产品之外,绿松石装饰的兵器、车马器也较多出现在中小型贵族墓中,甚至还出现在济南大辛庄、西安老牛坡等地方中心城市。显然,早期国家得到发展后,资源开发能力在加强,同时特权阶层扩大化,贵族层级增加。

西周时期,绿松石生产总体衰落。除了少数出现在兵器、车器上的例子,嵌片绿松石多在一些高等级贵族墓的玉柄形器组合中作为陪衬物出现。不过,这些嵌片往往被制作得非常规整,如随州叶家山M111的一些柄形器^[9](图三,2)。另一方面,由于玉礼器得到社会重视而发达,绿松石串饰与外来的红石玛瑙珠、琉璃珠,以及与传统的玉器组合,形成不同材质和色彩的组佩出现在高等级贵族中。这个情景,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

春秋中期社会发生大的变局,青铜器出

现许多新的气象，其中之一是开始流行容器器体上装饰绿松石嵌片。春秋中晚期，一些青铜容器的蟠螭纹、兽面的眼睛部位装饰有圆形绿松石独片表示眼珠。此后，容器装饰嵌片绿松石在长江中游的楚地和中原地区都较流行。例如，曾侯乙墓几乎所有的青铜礼器——包括九鼎八簋、五鼎四簋，以及鬲、鉴缶、豆等（图三，3），在纹饰部分都镶嵌有绿松石嵌片^[20]。由于曾侯乙青铜器体量和纹饰区域都较大，因此绿松石的使用量也会达到千克量级。战国中晚期，高等级器具使用黄金、趋于生活化的风尚流行，绿松石嵌片开始和错金银工艺结合，施加于一些接近生活化的青铜容器器类如壶、豆等，以及接近实用性的器类如带钩、削刀、剑等器物上（图三，4）。这样多材质的装饰，大大加强了器物的外在观赏性，也合乎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东周时期吴越两国也是绿松石制品发达之地。这里绿松石嵌片与其发达的青铜剑结合，装饰在剑格、箍之上，剑格绿松石嵌片往往构成兽面纹^[21]。吴越地区在当时应该已独立开发有绿松石矿料资源，一些越国贵族墓葬中绿松石产量和体量都很大^[22]。春战之际前后吴越与楚文化多有类似风格，青铜剑从形态、工艺到绿松石装饰多相似甚至相同（图四）。

第四阶段：精装饰阶段，始自春秋早期，流行于汉代至明清时期。嵌片一般以独片组合的方式，装饰在黄金饰品或器具上。

早期金器在古代中国的使用多是与北方游牧族群文化互动关联^[23]，较早将绿松石器结合在金器上也多发生在偏北的区域。早在商时期，李家崖文化就有将绿松石串饰连接在黄金耳饰上。两周之际，黄金制品开始在地理位置偏向西北的秦、芮、晋乃至虢等诸国兴盛起来。春秋早期偏晚的澄城刘家洼芮国墓葬，开始在黄金带饰的兽面纹上装饰独立的嵌片以表示动物眼、鼻^[24]（图五，1）。稍晚在春秋中期益门M2，剑、带钩等一批金器都有类似的独片绿松石装饰。从此，将嵌片修整成规整的圆



图四 战国时期青铜剑的绿松石装饰
1.越王勾践剑 2.当阳赵家湖楚墓李家洼子M13剑

形或者特别的形态成组地装饰在金器上，成为绿松石装饰的发展方向。与典型中原文化绿松石器联片的装饰风格不同，独片绿松石在金器上组合形成出色的整体装饰效果，这也与其后流行的宝石装饰作风一致。

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前期，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形成强烈的交流和融合之势，绿松石装饰也有进一步的变化。在此阶段，独片镶嵌已经成为嵌片绿松石装饰的主流工艺，水滴形的独片绿松石构图或可能有来自西北方向的影响。在北方草原地区，黄金器如动物形牌饰流行，并常常饰以独片绿松石。鄂尔多斯阿鲁柴登窖藏、燕下都辛庄头墓葬等遗存中，多件金器都装饰有绿松石嵌片。在中原文化系统特别是在汉代诸侯王墓葬中，独片绿松石结合黄金或鎏金器物装饰也成为时尚，如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的满城汉墓多见黄金或鎏金器装饰独片绿松石^[25]。汉晋之时，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瑞兽纹亚腰马蹄形带扣，如安乡黄山刘弘墓出土黄金螭虎纹带扣^[26]，其金珠工艺和绿松石装饰体现了草原因素和汉文化的结合（图五，2）。学者认为，这类带扣是



图五 绿松石与金器的结合

- 1.澄城刘家洼芮国墓葬带饰 2.安乡黄山刘弘墓黄金螭虎纹带扣
3.固原李谷村北魏墓金耳饰 4.钟祥梁庄王墓冠顶

体现汉中央政府对边疆控制的政治信物^[27]。在人类所使用的各种材料中，绿松石大约是唯一一种未经文化交流而在亚、非、美洲等不同地区独立起源与发展的材料。迟至战汉之际，亚洲大陆东西两侧的绿松石文化因素应该通过欧亚草原串联了起来。

北魏至唐代在对外的文化交融中，绿松石器也开始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宝石装饰方式。独片绿松石或与其他宝石、半宝石结合，组合排列成类似联片的效果，在以头饰为主的黄金饰品中起着增添色彩的作用。陕、甘、宁一带的北魏贵族墓葬出土的金耳环^[28]，常见绿松石与其他色泽的宝石镶嵌其上（图五，3）。唐代经济繁荣，绿松石器也有大量、多类的产量。传统的联片镶嵌甚至出现在许多螺

钲铜镜中^[29]。不过这类铜镜镶嵌的多为细碎的绿松石片，显现出发达的绿松石生产对边角料的利用。唐朝也推动了吐蕃地区绿松石文化的发展，并使之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文化传统。近年在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中，都出土了多类绿松石器^[30]。

明代装饰性金器发达，一些贵重的金器上再饰以各类宝石饰品，成为社会风尚。从定陵到各地藩王墓，出土的冠饰、头饰、带饰等金器中，多以不同色泽的宝石、珍珠与绿松石相间镶嵌，极尽奢华。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有多件绿松石与其他宝石结合的黄金冠顶、带饰、首饰^[31]（图五，4）。

二、二里冈和中商文化时期的绿松石礼器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绿松石龙和牌饰具有礼器性质，已多为学者所强调，甚至成为学界的共识。实际上，绿松石器作为礼器沿用到中商文化时期，这一点被学界有所忽略。虽然属于商代前期政治中心城市很少发现高等级贵族墓葬，但在盘龙城、小双桥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对此有充分的体现。

盘龙城是商代前期在长江流域最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其中城址与李家庄墓地、杨家湾分别代表了二里冈文化和中商文化时期聚落的核心区^[32]。研究表明，盘龙城城市最高首领墓葬在当地规模最大，随葬多套青铜酒器和大玉戈，这些墓葬包括李家庄墓地M1~M5，杨家湾M11、M13、M17^[33]。杨家湾M17镶嵌绿松石金饰，是将黄金与绿松石这两种珍稀材质叠加，以当时在长江流域独一无二的形式来呈现其礼仪性（见图六）。现在看来，这些高等级墓葬也可能都随葬类似杨家湾M17那样的绿松石礼仪用器。

李家嘴墓地邻近盘龙城城址和宫殿区，其中李家嘴M1、M3~M5墓室受到晚期完全破坏，只有M2完整保存。李家嘴M2在发掘报告中称有绿松石5件，出土于“棺槨内，每件皆由数十件磨成1平方厘米大小的圆角长方形小绿松石堆放在一起。其中标本PLZM2:32位于棺内腰坑北侧，与墓主人头骨紧邻，出土时呈放射状放置”^[34]。李家嘴M3墓葬也受到严重破坏，只残存少量随葬品，其中包括迄今所见商前期最大玉戈。M3出土绿松石一件（两片）：“圆形。呈绿色，为很薄的片状，径1、厚0.1厘米”^[35]，明显是属于兽面纹的眼睛。在杨家湾M11出土一件绿松石：“圆形，表面光滑，一面平，一面略呈弧状。上有裂纹。此件可能为铜器上的装饰件。直径1.3、厚0.15厘米”^[36]。杨家湾M13出土绿松石片，简报给出了4个编号，“均为绿松石片组成，薄片数量从几片到数十片之间，形状面貌不甚清楚。绿松石片体型较小，一般长度不超过1.4、宽度不超过0.2厘米；均为切割而成，形状各异，有四边形、三角形、长方形、扇形、椭圆形等”^[37]。以上资料清楚地表明，类似杨家湾M17那样的绿松石联片组成的、虚拟动物图案的器物，在李家嘴和杨家湾等其他几座高等级墓葬也都有存在。这些墓葬中不同形状的绿松石，应该就是组成纹样的嵌片，其中圆形嵌片用来表达兽面纹之类的眼珠。

郑州小双桥是中商时期都邑型遗址，其中发掘区IV是祭祀遗迹集中分布的区域，包括H6、H29、H91等出土绿松石嵌片的遗迹均被发掘报告列为祭祀坑。绿松石嵌片“182件。均用绿松石精心加工而成，表面及周边磨制精细，有的表面还经过抛光，……估计与牌饰或某种装饰品表面的镶嵌有关，集中出现在IV区的商代地层或遗迹中”^[38]。绿松石较多集中于H6、H29、H91等祭祀坑（图七），嵌片多为长条形，也有如李家嘴M3那样如长圆形，相信这些绿松石嵌片也是用来构成类似兽面的饰物。值得注意的是，H91还出土有一片金箔，残长0.9、残宽0.4厘米^[39]。H91绿松石和金箔让人



图六 黄陂盘龙城杨家湾M17镶嵌绿松石金饰



图七 郑州小双桥 H29 绿松石嵌片

很容易联想到杨家湾M17的绿松石金饰。杨家湾M17属于盘龙城遗址最晚的阶段，年代与小双桥H91接近。两个地点同时出现带金箔的镶嵌绿松石器，当非偶然。

盘龙城、小双桥以上绿松石器，和二里头文化的龙形器、牌饰一样，都是通过依附于木质或皮革等材质来造型，但同时绿松石联片又完全覆盖其依托，成为器物的主体，并构成兽面、龙等当时的主题纹样，使器物具有礼器的性质。这种礼器普遍存在于盘龙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又用于政治中心区域的祭祀活动，可以推测是当时上层社会的风尚。

三、绿松石器的礼仪性

礼仪是礼制的表达形式，礼仪的展现则往往是通过器物及其呈现方式表达的。表达礼仪性的器物往往具有以下属性：或者具有珍稀、贵重的特性，或者具有色泽、造型等外

观吸引力,再或者具有某种约束性的社会表达力。对于绿松石器而言,表达礼仪性又有两个层次,一是器物具有既定的礼器属性,二是器物虽不是属于礼器,但当其以华丽、贵重的方式呈现时,提升了使用场合和使用者的社会属性,也具有一定的礼仪性。以下从绿松石器作为礼器和礼仪性器物分别阐述。

绿松石因其色泽而被人们所喜爱。绿松石的地质形成机理使其深埋矿脉之中,开采和获取不易。制作装饰品需对其进行切割、打磨等耗时费力的加工整形工作。作为珍稀资源,绿松石还经过贸易甚至是远程贸易的社会交换。如此种种都说明,绿松石器具有普遍的奢侈品属性。

新石器时代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从装饰品、彩陶的出现和流行,到陶器、玉器的礼器化,都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的发展,也自然有着类似礼器化的历程。从生产的角度而言,当绿松石被深加工为扁平的牌形,特别是作为标志物点缀在玉、石串饰中,无疑使装饰品的展示性被加强。稍晚出现的联片绿松石装饰,不仅是进一步对绿松石的深加工,还在形态上突破了绿松石制品体量的局限。另一方面,绿松石器的发展又是一个社会资源被整合、控制的过程,联片绿松石器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大范围出现,关联着资源的集中和垄断,这正是从黄河流域上游到长江流域下游广泛的、高度复杂社会的表征。不难注意到,嵌片绿松石器的流行,大体与璋、戈、琮等玉礼器的出现同时。因此学者认为临朐西朱封、日照两城镇大墓等地绿松石嵌片作为礼器使用,是很有见地的认识。新石器时代末期联片绿松石器从技术到社会性的成形,发展成为二里头文化联片绿松石的龙形器、牌饰等礼器,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绿松石器和玉器一样,都是从装饰品升级为礼器、作为上层阶级的标志物。

殷墟文化时期开始,联片绿松石转向装饰兵器和车马器,是绿松石器社会性的重要

转型。可以说,二里头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性物质文化成就,是青铜器类的容器和铃、玉器类的牙璋和戈、绿松石类的龙形器和牌饰,甚至包括陶器类的盂和爵,并列为二里头国家的礼器。随着早期文明的发展,代表社会资源、生产和技术复杂性更强的青铜器,可以配合更大的社会场景,也更加适合宴饮等社会性活动,还具有更佳的展示效果,脱颖而出成为商周社会的中心礼器,也使玉器和绿松石器跌出礼器的核心圈。殷墟文化时期装饰绿松石的钺、戈等兵器和弓形器等车马器往往会出现现在较为高等级的墓葬中,但同时并不意味着高等级贵族使用或随葬器物必定装饰有绿松石。换言之,此时的绿松石器可以表达出使用者可能较高的地位,但又不像青铜器那样,作为表达较高地位的必备物。

绿松石器这样的性质延续到东周时期,装饰范围开始延伸到青铜礼器和带钩、削刀等日用品。不过和殷墟时期的情况相似,青铜礼器中常见有使用绿松石装饰的情况,但使用绿松石装饰并未成为青铜礼器的标准配置。例如曾侯乙墓青铜礼器中普遍使用绿松石装饰,体现了曾侯乙较高的等级和财富。但其时绿松石矿源得到了充分开发的楚国,只是在汉水上游一带的战国楚墓青铜器中多见绿松石装饰,同样高等级天星观、九连墩楚墓青铜器中几乎不见绿松石装饰。这一阶段,绿松石在青铜礼器中装饰的对象,多出现在那些制作精美、更为生活化的壶、豆等器类,反映了东周、特别是战国时期礼器重视的方向。绿松石生活化的倾向,还体现在战国中晚期流行青铜剑、带钩上的装饰,这也是其后绿松石与黄金饰品结合的社会基础。

黄金是在文化上最被普遍认同的贵重金属,黄金饰品与绿松石的结合,也在中西文化中不约而同地发生,并通过游牧文化融汇。自商以降的古代中国,绿松石与黄金结合的装饰,一直蕴含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绿松石与黄金这两种同样鲜艳、同为奢侈品的材料结合作为服饰,是进入封建帝国后社会上层经常

性的选择。因此春秋早期之后绿松石与黄金的结合,是绿松石器由礼仪性向现实性的转变的最终形式,也可以说是礼仪性在世俗生活中的表达,同时还是社会发展高度和社会财富的体现。如果说绿松石装饰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必然选择,则绿松石结合黄金也是铁器时代的一个自然的文化现象。

总体看来,虽然体量较小,但绿松石在古代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都有非常亮丽的表现。从人体装饰上升到礼仪性器具,从对青铜器的装饰再转向对黄金饰品的点缀,绿松石以上发展,基本都由嵌片的技术方式完成。嵌片形成的复合材质,往往会超过、提升原有主体器物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单一材质的绿松石串饰虽然贯穿于古今不同时期,但其价值空间有限,很难占位于高等级社会空间。另一方面,绿松石器总体的发展,又和玉器有着大体相同的历程,即从作为人体的装饰,上升到礼器的地位,再转而成为富有礼仪性的服饰。但古人对于绿松石和软玉之间的差别,一直有着清楚的认知。

附记:2021年3月有幸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院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绿松石综合研究研讨会”,让我能够注意到盘龙城高等级大墓中普遍使用礼仪性绿松石器,也注意到古代中国绿松石的文化意义。本文是一年多来对古代绿松石形成的粗浅的认识,撰写的目的是想引起学界对绿松石考古的重视。曾攀、陈春二位先生惠供越王勾践剑、梁庄王冠顶图片,一并致谢!

注释:

[1]在古代世界,古埃及和玛雅文化曾经和中国一样批量生产绿松石制品并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但生产规模比中国小得多。

[2]本文使用“串饰”而非学界常用的“坠饰”,是想强调这类穿孔的饰件,不仅包括坠状饰,还有腕饰、项饰等串联的饰件,以及其他以穿孔方式串缀在服装或其他器具上的例子。如舞阳贾湖M58绿松石片分布于墓主全身,很可能就是缀附在服装上的。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2015年。

[4]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5]王春法主编:《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朱超:《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发现大汶口聚落》,《中国文物报》2022年3月25号第8版。

[6]庞小霞:《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考古学报》2014年第2期。

[7]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4)》,文物出版社,2015年,彩版五四。

[9]格桑本、陈洪海:《宗日遗址:文物精粹与论述选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图版七。

[10]王青:《移植汇聚——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和传布》,《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88~315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第贰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998~1006页。此外,这部二里头报告中,M3龙形器上还同出铜铃(2002 V M3:22),报告彩版282显示,铃上有两条联片绿松石。不过,根据报告第1004页铃“粘附有绿松石龙形器上剥落的绿松石片”,经求证赵海涛先生,该铃上的绿松石应该属于龙形器。

[12]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3]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14]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9~277页。

[15]许宏:《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9~53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2020年第8期。

[17]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3期。

[18]孙卓:《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青铜牌形器和金片绿松石器的复原》,《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唐际根等:《盘龙城杨家湾“金片绿松石兽形器”的原貌重建研究》,《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

[20]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21]越王勾践剑剑格两面的兽面纹,在铭文的一面镶嵌蓝色玻璃,另一面镶嵌绿松石嵌片,如图四。

[22]如东阳前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绿松石器及半成品数百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东阳前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8年第7期。

[23]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西域考古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24]刘翔:《古芮之光——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文物展赏析》,《收藏》2021年第3期。

[25]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2)》,科学出版社,2019年,图196。

[26]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1·金银器(一)》,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图220。

[27]郭物:《作为政治信物的汉晋瑞兽纹带扣》,《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7期。

[28]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中),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8、99页。

[29]陕西省文物局等:《周秦汉唐文明特集》(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图12。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2021年第8期。

[3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梁庄王墓》,文物出

版社,2007年,第120~182页;湖北省博物馆:《金相玉映:湖北省博物馆藏金玉器》,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48~110页。

[32]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

[33]张昌平:《从出土玉戈看盘龙城等城市的高等级贵族》,《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

[3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3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

[3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37]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M13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第6期。

[3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33页,彩版五〇、五一。

[39]此金箔形状不详,报告未提供图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28页。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urquoise Objects and Their Ritual Significance in Ancient China

ZHANG Changping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urquoise objects and jade share similar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social meanings, and both serve as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urquoise objects in ancient China underwent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use of a string of beaded objects, ritual objects, roughly decorated objects, and finely decorated objects, respectively. The early development strongly emphasized the ritual significance of turquoise objects while the later developmen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gem nature of turquoise. The turquoise dragon and plaque ornaments unearthed at the site of Erlitou were used as ritual objects, and so were the objects with animal face motifs, a practice that continued into the middle Shang period. The decorative nature of turquoise is noticed on ritual objects of the early states and in the meanwhile, the ritual significance is also noticed in turquoise objects serving other purposes.

Keywords: turquoise;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echnology; ritu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校对:陈丽新)